

从古典到现代

——中国文学演变主潮之1840~1916

尚静宏 杨亮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CONG GU DIAN DAO XIAN DAI

从古典到现代

——中国文学演变主潮之 1840~1916

尚静宏 合著
杨 亮

河南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古典到现代:中国文学演变主潮之 1840~1916/尚静宏,杨亮著.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649-0540-8

I. ①中… II. ①尚… III. ①中国文学:近代文学—文学研究—1840~1916
IV. ①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3661 号

责任编辑 纪庆芳

责任校对 辛 媛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开封智圣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53 千字

定 价 5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前言

时间常常是一个长度概念,它会随着我们的感觉发生变形,会改变我们的空间记忆,也会让我们的理解与阐释发生变形,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在一个时间的框架内进行。基于此,百年之回顾就不仅仅是一个无意义的话题。

学界先进曾对1840~1916年间中国文学演进中的一些令人关注的现象予以探讨,对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隐藏着的规律性作用机制给予深切关注,并做过大量相关论述。但遗憾的是,他们的立论或过多受限于执政党早年革命时期的文学领域,经常性地造成论述浅尝辄止,力度显得分散,不够深入。本书尝试对这些问题深入讨论,以求结论更为可靠。

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10月9日,作为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上的讲话》中指出,辛亥革命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个论断标志着官方在逐步扬弃早年革命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后,对辛亥革命的全新认识。透过这一论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在1840~1916年间面临的双重任务:民族革命,即推翻满清贵族统治,光复中国;民主革命,即建立现代政体国家,保障人权。研究20世纪诸多问题,传统与现代这两个词汇仍是一个关乎中国文学走向的根本性问题,基本我们常说的古今之争、中西之争等都可以从中找到根源。

王富仁先生曾经将1840年以来在“挑战一应对”机制作用下不断发生变化的中国社会的主流进程作出如下高度简化的概括:

洋务运动(对西方高度发展的物质生产力的追求)→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追求和有关思想的启蒙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学运动(对社会思想意识变革的追求,中国的文艺复兴)。(《王富仁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32~33页。)

这是对中国社会变化的主流趋向的准确描述;同时,我们会发现,对现代性追求的不断深化,才是引发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种种变革的真正动因之一,而中国文学在这一时期的面貌变迁也注定与此密切相关。循此思路,本书对中国文学在1840~1916年间的复杂历程予以全方位考察,探索其与因各个层面的现代性因素不断渗入中国社会生发的中国社会现代性体验形成的萌

芽—生长—深化历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因此而导致中国文学的种种新变化。

秦晖先生在考察中国近代学术史时,认为:“一个时代的特征在于它那不同于其他时代的东西,而不在于相信那些东西的人是否已经成了算术上的多数”^①,因此,诞生在本时期的现代性文学虽然一度貌似弱小,但因为其预示着中国文学的未来,代表着中国文学演进的前途,因而,也就成为这个时期中国文学演进中最有生命力的一部分。本书有意识通过章节安排的先后,表达出对中国文学史上这样一种新生事物的格外关注,也就势在必然了。

我们在研究百年文学思潮时,往往很难摆脱“每一位经典作家(诸如历史、道德或政治理论方面)必然在构成某一主题的每一个论题上形成了某种学说体系。这很容易陷入这样一种范式(尽管是无意识的):即楞是要‘找出’某一著作家在所有无可争议的主题词上的学说体系”^②。这种研究很容易“不可避免地受到涉及这一领域某些明显特点的预先判断的设定”^③。福柯(Michel Foucault)敏锐地发现这种研究弊端,所以他的“知识考古学”就是强调思想的研究,不应仅仅追问文本里观念的普遍性意义,而是应该关注构成这些文本的话语结构和叙事方式。思想史的文本不能仅仅成为说明历史真相的“基本事实材料”,而是应该被赋予比喻性和修辞性的语言规则。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尽可能从文学现象的描述入手,而不是基于某种现有理论来研究。同时尽量避免教科书的叙述模式和套路。

从这个理念出发,本书将 1840~1916 年间的中国文学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 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期,即 1840~1916 年甲午战争前夕,本时期分为四章。第一章,《语境:现代性体验缓慢地渐渐发生》。本章主要论述本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及其引发的文学语境的新变化,即现代性因素逐渐渗入中国社会;现代性因素开始出现在中国文学中;新旧杂糅的文本言说空间。第二章,《现代性文学的初步呈现》。本章主要关注萌芽期的现代性文学状况,即传统诗文的现代转型最初尝试,现代性小说的艰难启动,现代职业文学创作的开端。第三章,《主流文坛的诗文创作》。本章主要论述主流文坛在本时期的突出现象,即面对变局的初步反应,宋诗运动席卷主流诗坛,桐城派古文的兴盛。第四章,《文坛边缘地带的读物》。本章主要关注在当时处于文坛边缘地带、登不得

① 秦晖:《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南方周末》2010 年 6 月 17 日。

② 昆汀·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见《思想史研究》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3 页。

③ 同上,第 59 页。

大雅之堂的大众读物,即变异的侠客,“狭邪”的言性。

2. 现代性体验渐成社会主流的新时代,即 1894 年甲午战争至 1911 年,本时期分为四章。第五章,《时代:现代性体验渐成社会主流》。本章主要论述中国社会生活新变化及其引发现代性文学走向初步繁荣。第六章,《民族革命思潮的物化文本》。本章主要关注民族革命的志士们所做出具有鲜明现代性特征的文本的情况,即现代性的女性文学开始萌芽,颇有声势的革命派诗文创作,革命者的小说创作。第七章,《现代性文学的另一维度》。本章主要论述在政治上基本秉持君主立宪立场的人士的文学创作状况,即维新志士的文学活动,蔚为大观的“新诗”创作,步入高潮期的现代性小说创作。第八章,《古典性体验的顽固坚守》。本章主要论述在新时代依然不肯自动从中国文学舞台上消退的传统旧文学状况,即同光体诗歌,古文与小说。

3. 现代性体验的继续深化的时期,即 1912~1916 年间,本时期共分为 3 章。第九章,《酝酿:现代性体验的继续深化》。本章主要论述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体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深化及其对文学的深远影响,即与政体现代性的初步实现相伴,现代性因素在中国文学中持续累积,“回旋中”的现代性文学。第十章,《现代性体验继续深化的镜子》。本章主要论述现代性体验的继续深化在精神内涵和创作环境两方面文学的影响,即零余者的悲怆身影,留下时代的写真。第十一章,《民初文学演进的丰富性》。本章主要关注民初现代性文学亟待突破之处和普遍的创作概况,即徐枕亚的意义,鸳鸯派群星及其他。

基于辛亥革命是民族革命的原则立场,除以上各章行文中对各种文学现象予以客观剖析之处,本书特别另立第十二章,《异趣的中文创作》。本章主要关注 1840~1911 年间作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民族——满洲民族成员运用中文进行文学创作的状况,即丰富的诗词创作,缅怀与卫护。

在以上十二章论述的基础上,本书“结语”部分继续对 1840~1916 年间中国文学的状况以及所对应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得出结论:1840~1894 年甲午战争前夕,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性的缓慢发生,中国现代性文学开始萌芽;1894 年甲午战争至 1916 年间,伴随着中国社会政体现代性的开始初步实现,现代性文学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成熟;同时,本时期出现的新文化运动,意味着“五四”新文学,已经呼之欲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五四”新文学只可能出现在中国民众完成复国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新生的现代中国社会中。1912~1916 年间的中国现代性文学的进一步成熟,最大程度地为“五四”新文学的出现提供了准备,成为孕育“五四”新文学的温床。

应该说,这个结论是在对 1840~1916 年间中国社会及文学现状进行切实考

察后得出的,其中更包含着对学界研究成果的融汇,希望能够自成一说。徐复观言及近代知识分子时有非常严厉的批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就一般的来说,在消极方面,缺少分析思考的能力,缺少艰苦实践的精神。在积极方面,则常以浪漫的情调,与彻底自私的现实主义作不调和的结合。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只是一个性格的两面。在这种性格之下,很容易接受什么,在接受时不愿多作考虑。也很容易抛弃什么,在抛弃时绝无半毫顾惜。而最后的立场,亦即最后决定其意志的,却只是自己的名,自己的利,为了这,可以不顾一切。正因为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殊性格,便缺乏了担当建立民主政治的真正文化上的努力,因而在我们历史命运的总挫折中,应当分担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的责任。”^①虽然本书对其涉及的文人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展开深入讨论,但是徐复观先生的话确实是对国民性的诸多问题的深入洞察。

我与尚静宏兄 12 年前相识于桂林的广西师大,巧合的是尚静宏是辉县人,我是卫辉人,两地距离不过 50 里许,外人常把两地弄混,我们俩不仅是同乡,而且后来还在一个寝室,同寝室的还有孙振田、侯新兵。四个人脾气相近,志趣相投,每天忙完自己的专业学习之后,聊天就是我们几个人最主要的日常生活,到现在我也认为聊天是增长见识与学术功力的最主要的方式之一,益友清谈之珍贵,只有经过此番阅历方能有深刻体会。尚兄年长我 10 岁,阅历丰富,读书广博,思维敏锐,从某种角度来讲,我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和深化都曾受过他的启发。多年之后,我和孙振田的交流中也谈到我们在思想上受过尚兄的影响。可惜的是,我的人生理想是良辰美景,泉石花竹,品茗赏鉴,小酌半醺,以此不失人生之乐,尚兄倒是以此笑我。金观涛说:“就历史研究而言,如果没有关心人类命运的宏大心灵和跨学科研究纲领,那么再专业化的诉求都可能把我们引到黑暗中去。”^②试问,哪个专业研究不应该如此?这几次因为商量稿件,见尚兄两鬓已有白发,但思想的敏锐度上仍不减当年,风采依旧,亦使我心中自喜,想其会有更大进益。

杨亮作于河南大学卧云楼

^① 《中国历史命运的挫折》,见《中国思想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 1988 年版,第 258 页。

^②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 页。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语境:现代性体验缓慢地发生	(1)
第一节 现代性因素逐渐渗入中国社会	(1)
第二节 现代性因素开始出现在中国文学中	(13)
第三节 新旧杂糅的文本言说空间	(25)
第二章 现代性文学的初步呈现	(38)
第一节 传统诗文现代转型的最初尝试	(38)
第二节 现代性小说的艰难启动	(49)
第三节 现代职业文学创作的开端	(61)
第三章 主流文坛的诗文创作	(74)
第一节 面对变局的初步反应	(74)
第二节 宋诗运动席卷主流诗坛	(86)
第三节 桐城派古文的兴盛	(97)
第四章 文坛边缘地带的读物	(109)
第一节 变异的侠客	(109)
第二节 “狭邪”的言情	(119)
第五章 时代:现代性体验渐成社会主流	(131)
第一节 现代性因素加速进入中国社会	(131)
第二节 现代性因素在中国文学中成长	(144)
第三节 现代性文学的趋于繁荣	(157)
第六章 民族革命思潮的物化文本	(173)
第一节 现代性的女性文学开始萌芽	(173)
第二节 颇有声势的革命派诗文创作	(187)
第三节 革命者的小说创作	(198)
第七章 现代性文学的另一维度	(210)
第一节 维新志士的文学活动	(210)
第二节 蔚为大观的“新诗”创作	(224)

第三节 步入高潮期的现代性小说创作·····	(233)
第八章 古典性体验的顽固坚守·····	(249)
第一节 同光体诗歌·····	(249)
第二节 古文与小说·····	(259)
第九章 酝酿:现代性体验的继续深化 ·····	(271)
第一节 与政体现代性的初步实现相伴·····	(271)
第二节 现代性因素在中国文学中持续累积·····	(283)
第三节 “回旋中”的现代性文学·····	(295)
第十章 现代性体验继续深化的镜子·····	(309)
第一节 零余者的悲怆身影·····	(309)
第二节 留下时代的写真·····	(320)
第十一章 民初文学演进的丰富性·····	(331)
第一节 徐枕亚的意义·····	(331)
第二节 鸳蝴派群星及其他·····	(342)
第十二章 异趣的中文创作·····	(353)
第一节 丰富的诗词创作·····	(353)
第二节 缅怀与卫护·····	(361)
结 语·····	(373)
重要参考文献·····	(386)
后 记·····	(406)

第一章 语境：现代性体验缓慢地发生

第一节 现代性因素逐渐渗入中国社会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非常精辟地指出：这场战争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恰如欧美列强对其他处于前现代发展阶段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举动一样，“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①。即中国社会开始被动地面临现代性因素的不断渗入。而“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因此，1840～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为了挽救王朝的覆亡，清朝统治者及其效忠者群体做过许多努力，使得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充满了复杂性。

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南京条约》，使清朝统治者为加强对中国社会的统治而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军舰大炮打开，再也不能复合”^③。紧接着，在“清政府官员已成了惊弓之鸟”^④的状况下，欧美各国利用这些官员对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92页。

③ 柏杨：《柏杨全集》第17册，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50页。

④ 柏杨：《柏杨全集》第17册，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50页。

代国际政治的茫然无知，蜂拥而至，同清朝政府签订各种条约。在这些条约的影响下，现代性因素开始向中国社会渗入。

但鸦片战争的阵痛很快被清朝统治者抛到脑后，他们并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包括皇帝在内……看不见破产的农村和农民们的悲惨流离，他们依然歌舞升平”^①，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极大困扰被完全忽视。但饱受压迫的中国民众目睹了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和满洲人的纸老虎已经被戳穿”^②，抗暴运动更加如火如荼，终于在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于广西区的桂平县金田村。太平天国运动持续14年，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国土，沉重地打击了清朝政府，“满洲人手中的军权，从此转移到汉人手中”^③，使其统治能力的效能大大弱化，这成为中国人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

太平天国运动曾发布文告，怒斥自1644年清军入关以来，中国大地上便“妖胡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于五湖，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今满洲另置顶戴，狐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之也。……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④。由此“反清驱满”成为其旗帜之一。也正是因为这样，在清朝末年的革命运动中及辛亥革命后的长时期中，太平天国运动曾受到各种各样的溢美，甚至有后世历史学家注意到，以基督教义为号召的太平天国运动“做出种种使守旧的顽固派痛心的改革，诸如：禁止妇女缠足，禁止吸食鸦片……禁止男子娶妾……割掉辫子……改用阳历。这一连串的制度，使中国凭空跃进到一个

① 柏杨：《柏杨全集》第17册，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54页。

② 柏杨：《柏杨全集》第17册，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54页。

③ 柏杨：《柏杨全集》第17册，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61页。

④ 《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162页。

新的境界”^①，“至少使中国跃进一百年”^②，因而极为惋惜这场民众反抗运动的失败。在这种主流的声音之外，也一直有异议的声音，双方有时甚至会有激烈的争论。

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对太平天国运动洞若观火。首先，肯定了这场运动所具有的天然合理性：“中国是被异族王朝统治着。既然已过了三百年，为什么不来一个运动推翻这个王朝呢？”^③所以，他们在关于太平天国的评述中，从未使用诸如“农民革命”、“农民起义”的定性字样，而是使用“中国革命”、“中国的起义”、“中国人”革命、“反正的平民”（旧中国泛称老百姓为平民）等词语，明确地指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是“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起义民族”的“人民战争”。^④接着，经典作家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军穿着五花八门的丑角穿的服装……中国人却以为这是一种护身符。”^⑤在这场运动中，“除了换朝代之外，他们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⑥。因此，“太平运动实质上乃是一种完全空洞的运动”^⑦。而“太平军大概就是中国人脑子里所幻想的那种现身的魔王吧。但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的魔王。这类魔王是停滞的社会生活之产物”^⑧。因此，历史上真实的太平天国，远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美好，所谓改革只存在于纸面的传说中，从未有过认真的实践，太平天国运动对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社会的积累，几乎没有直接的积极作用。

① 柏杨：《柏杨全集》第17册，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58页。

② 柏杨：《柏杨全集》第17册，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6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0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2页。

1857~1860年间,清朝政府在为太平军焦头烂额之时,“又因为过度的愚昧”^①,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圆明园这个“用中国人民的血和泪筑成,作为皇帝一个人和他周围女人们专用的游逛和娱乐场所”^②,作为对清朝政府对现代国际关系准则的一无所知的报复,被英军一把火烧成瓦砾堆;清朝政府与英法两国签署条约,允许各国使节进驻北京,并在必要时可以直接觐见皇帝;为了躲避英法联军的锋芒,时任清朝皇帝的爱新觉罗·奕訢逃奔热河,病死在那里;在战争期间,俄国“只凭恐吓和诈术,就硬生生地夺去了九十八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③。这次战争的后果比起鸦片战争来,更让清朝统治者难堪,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统治能力被进一步弱化。

战争结束后,因主持对外条约的签订而备受刺激的爱新觉罗·奕訢主持政府,联手依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的官员曾国藩、李鸿章等,冲破顽固守旧派的重重阻挠,以“自强”、“求富”为号召,决心“师夷长技”,吸取来自西方军事现代性的具体成果,建设清朝政府自己的“坚船利炮”,掀起以器物层面的现代性为核心追求的变革运动——“洋务运动”。1860~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清朝政府首先设立相当于外交部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理同各国的外交事务,并进一步成为“洋务运动”的总指挥部。经过不懈努力,清朝政府拥有了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巨舰巨炮,俨然成为远东头号的海权大国。

1883年,清朝政府因为越南问题同法国发生战争。由于此时的清军开始初步实现装备的现代化,虽然在战争进程中,法国军方多有斩获,在大部分时间段内占有优势,却在镇南关被清军大败,消息传到巴黎,法国内阁被迫倒台。清朝政府趁机接受国际调停,在尽到宗主国应该尽的义务、没有逃避责任的前提下,体面退出战争。同法国的这场战争表明,由于“洋务运动”的成效,自1870年代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清朝帝国“在世界上虽已不再是超级强国,但仍保持一等强国的尊严”^④,清朝政府的统治在经历危机后,又暂时趋于稳固。

① 柏杨:《柏杨全集》第17册,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64页。

② 柏杨:《柏杨全集》第17册,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69页。

③ 柏杨:《柏杨全集》第17册,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74页。

④ 柏杨:《柏杨全集》第17册,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93页。

1840年,当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被清朝政府紧紧关闭的中国国门时,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爱新觉罗·旻宁对这个西方国度茫然无知,发出一连串令后人发笑的疑问:“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①即使一向被认为已经“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对现代国际政治同样一无所知,他力主对英开战的理由之一是“夷人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②。战争结束后,被认为当时反思战争比较深刻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魏源,竟如此描述源自西方的天主教:“男女共宿一室,临终前牧师取病人眼睛,用以从铅中炼制白银。”^③这种对天主教的污蔑之词,以后多次作为“教案”出现在对天主教的指控中。

事实上,1840~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在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心目中依然神圣不可侵犯。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依然如此愚昧,所以曾国藩效忠清朝,其镇压反抗清朝野蛮专制压迫的太平天国运动时,掩饰自己为清朝政权效力的理由就是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以尽”,号召读书人“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④。曾国藩此举为自己争得了传统士大夫包括下层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支持,儒家文化竟然成为清朝政府杀向中国民众的一把无形的屠刀。同时,这也导致1840~1893年甲午战争前夕,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对科举功名有着后世难以想象的执著追求。科举取士制度像一张巨大无形的网,既极大地限制着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职业选择,更严重地禁锢着他们的思想,钝化了他们对新事物的敏锐观察力,当时的“中国文士,专上制艺……即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又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⑤。而这种现实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传统专制社会中君权至高无上的观念,使得1840~1893年甲午战争前夕,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地

① 钟叔河:《一个同文馆学生的观察》,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② 钟叔河:《两千年岁月,五万里行程》,斌椿《乘槎笔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③ 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242页。

④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鸿宝书局民国六年(1917)石印本。

⑤ 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50页。

位决定了他们本身的进退、荣辱、迁沉与政权的兴衰密切相关,所以,爱国救亡这面悲壮的旗帜,在士大夫那里固然是为了捍卫民族独立,使它免遭列强欺凌,也包含着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内容。”^①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甚至错误地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顺应西风东渐的时代发展要求、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做出一些努力(主要是军事、工业领域)的洋务派造成了“人心败坏”“士风不正”。^②所以“西学东渐带来的变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巨大惰性相比,实在太小了。中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与几千年形成的强大的封建经济相比是多么微弱”^③。

鸦片战争后,魏源等人迅即认识到,要真正有效地维护清朝的统治,就必须吸取西方军事现代化的具体成果来武装清军,于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成为“洋务运动”的理论先声。“乱定之后,经曾文正、李文忠这班人提倡,忽有‘洋务’、‘西学’等名词出现。”^④尤其是“江南制造局成立之后,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李壬叔、华若汀等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有还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变了”^⑤。湘军集团以其军功跻身统治集团上层,与爱新觉罗·奕訢联手掀起一场学习西方的自强运动,引起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政治格局、文化教育的某些变化。当“洋务运动”开展时,为了经济来源和培养实用的人才,洋务派采取了许多措施:设立同文馆,以培养外语人才,成为中国社会教育现代性的开端;设立一系列兵工厂,以及为其服务的译书局,现代军事工业开始进入中国社会,中国人开始对科技现代性有了直观的认知;选派赴美留学生,中国知识界开始有机会直接认知现代社会;设招商局,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出现现代化商业机构;爱新觉罗·载淳会见各国进驻使节,派驻英国公使,中国社会开始融入国际社会;修筑铁路,架设电报,中国大地上交通、通讯开始走向现代化;铸造银元,建立一系列民用工厂,经济现代

① 李耿年:《略论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演化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云南学术探索》,1995年第1期。

② 徐致祥:《嘉定先生奏议》卷下《清举行经折筵》,万有印书馆1912年版。

③ 李耿年:《略论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演化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云南学术探索》,1995年第1期。

④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⑤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

性开始走入普通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①湘军集团这一群标榜所谓“经世致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力挽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的大厦于将倾,以学术为政治服务,甚至还拿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专制统治服务,由此直接把西方科技引介到中国。从此,现代新式教育出现;大量西方译著和教科书出版;多种现代学科产生和早期科技队伍形成;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体验开始在多个领域萌芽或累积。湘军集团企图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挽救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但恰恰是这种行为在悄然酝酿着中国社会观念的重大转变。^②这些生活中的变化都在加深着中国民众对现代性的感知。

事实上,即便参与“洋务运动”的头面人物爱新觉罗·奕訢和他的汉人伙伴曾国藩等人权倾朝野,权势熏天,他们的改革依然阻力重重。1866年,爱新觉罗·奕訢奏请在同文馆设立天算馆,招募人才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尽管这个机构的规模很小,但这种做法仍然遭到守旧的顽固派的强烈抨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原因,在人心不在技艺”,因此选拔“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学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③?这种理念对洋务运动阻碍极大,但也普遍存在于官场中人的意识深处,在那么无法进入仕途的非正统知识分子那里同样根深蒂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美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也。中国立治之极也,必推三代,文质得中,风醇民朴,人皆耻机心而贱机事。而西国所行者,皆凿破其天,近于杂霸之术,非纯王之政。其立法之大谬者有三:曰政教一体也,男女并嗣也,君民同治也。商贾之富皆归于上,而国债动以千万计。讼则有律师,互教两造,上下其手,曲直皆其所主。男女相悦而婚,女则见金夫不有躬,而无财之女终身无娶之者。……陋俗如此,何足为美。夫所贵乎中国者,能以至柔克至刚,至弱克至强也。说者谓如是则西国不难驱而远之矣。则请一言以决之曰:在德不在力”^④。“重道轻器”心理表露无遗。

同时,即使在现代“地球”学说进入中国社会后,古典性体验中的“中国中心”幻觉依然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依然在为自己寻找着非科学的种种辩

① 柏杨:《柏杨全集》第17册,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89~591页。

② 高照明:《湘军与西学东渐》,《东南大学学报》(社科辑刊),1993年。

③ 《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页。

④ 王韬:《与周弢甫激君》,《弢园尺牍》卷4,中华书局1959年版。

解,如“夫大地以中原为正中,阴阳之和会,最得五行之全,自古神圣皆成此地,此外四裔皆荒昧……试观天星分野独应中国,即其明验矣”^①。正是沉醉在诸如此类的自我辩解中,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在长时期内,仍然无力自拔于古典性体验,认为中国依然是居于“正中”的“神圣”之地,将一如既往地受到上天的垂青。甚至到了1870年代,在中国社会中,认识到“地形如球,环日而行……我中华明此理者固不乏人,而不信是说者十常八九”^②。中国社会的进步步伐之缓慢可见一斑。

“由于中国是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之中,中国在技术、制度、语言和观念上都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自我满足感。在悠久的岁月里,受过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之精粹不知世上尚有在任何方面足以与他们自己的文明相颉颃的其他文明。……(据此,中国人自然)以为中国文化在一切方面都优于其他一切文化。”^③这种“中优外劣”心态的顽固存在,导致中国社会在应对伴随战争而来的西方文化的强力挑战时,无法做出适宜的反应,而长期把目光积聚于“器物”层面,大大延缓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现代性因素的不断渗入注定要在努力保持一潭死水现状的中国社会中不断掀起波澜,虽然1840~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对现代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但其认知程度却在不断加深。

随着国际贸易和通商口岸城市的逐渐发达,来自西方的洋火、洋油灯、毛巾、肥皂等很快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逐渐击败火石、油盏、土布、皂荚等土货,成为中国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体验的组成部分,靠近上海洋场的地方首得风气之先:原来人们习惯使用的“取火之物,向用火石……人家莫不备之;光绪乙未、丙申之际,始改用火柴,俗称‘自来火’,为欧洲输入品。夜间取光……光绪中叶后,多燃煤油灯……洗面擦身之布,旧时多用土布……自毛巾盛行,即下至农家,亦皆用之。洗衣去垢……自欧美肥皂行销中国后,遂无有用皂荚者。计时之器……自轮船、火车通行,往来有一定时刻,钟表始流行”^④。在上海滩这样的示范作用下,来自西方的器物逐渐在更广阔的中国土地上流行起来,以

① (台湾)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24辑,第127~128页。

②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2页。

③ 莱特:《论中国史研究中的普遍化应用》,转引自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④ 黄苇、夏林根:《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3~344页。